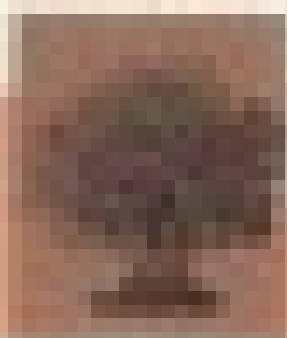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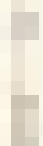
龙
云
◆
著



跨文化视域下的爱默生思想研究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跨文化视域下的爱默生思想研究

龙 云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跨文化视域下的爱默生思想研究》(13YJC752014)资助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
(CIT&TCD 201304011)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视域下的爱默生思想研究 / 龙云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300-19679-4

I. ①跨… II. ①龙… III. ①爱默生, R. W. (1803~1882) — 文学研究 IV. ①I7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5479 号

跨文化视域下的爱默生思想研究

龙 云 著

Kuawenhua Shiyu xia de Aimosheng Sixiang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 × 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25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0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本书采用伦理学、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分别从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爱默生的思想，旨在揭示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启示意义，研究结论有助于化解多年来学界关于爱默生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地位的各种分歧性观点。

人的存在问题是爱默生思想的出发点，“伦理化存在”被看作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并被确立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爱默生把作者称为“价值预设性的作者”和“有意图的作者”，他们通过表现心灵的共性来提升人们的存在意识；他的传记创作提供了一种表述“伦理化存在”精神的文学范本。爱默生把读者称为“作者的作者”，赋予读者判断性的选择来规避绝对的价值预设，读者通过自主性和自律性的阅读方式增强理解人的自由本质、提升自身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爱默生把文本看成作者和读者的经验之和，创立了交互参照式的叙事模式来论证两者在“伦理化存在”上的思想共识。文本的伦理功能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方面的价值预设来实现伦理的公理化，促进普遍的道德思考并推动读者的伦理意识从“个人之善”走向“公共之善”。爱默生将文学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放置在一个有机环动的模式中，他由对文学层面的个人伦理价值的关注转向对文化层面的普世价值的关注，并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共性扩展为世界范围内国家间对于普遍共性的思考。爱默生的思想实现了两个突破：由事实认知转向价值判断、由回顾式的联想转向前瞻式的展望。

本书先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追溯了爱默生思想形成的渊源，结合爱默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一条“经验—理性”的认知思维作为贯穿全书逻辑结构的线索，结合爱默生文学思想的发展渊源将“伦理化存在”确立为本书的核心主题，然后从文学创作伦理准则、文学阅读伦理准则和文学文本伦理功能三个层面立体地把握爱默生的思想，并勾勒其思想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炼出爱默生思想中普世价值的内涵，结论指出爱默生的思想具有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指明了文学创作的三重境界：伦理的（作者）、人性的（读者）、社会的（文本），并从宏观视角阐释了世界文化中普世价值和“世界大同”构想的内涵和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3
第三节 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	4
第二章 爱默生思想形成的渊源.....	6
第一节 哲学影响之源.....	6
一、苏格兰常识哲学的“道德感”.....	7
二、格兰多哲学的关联认知.....	8
三、斯多葛哲学的理性之维.....	9
四、康德哲学与道德自律.....	11
五、黑格尔哲学与普世精神.....	12
第二节 文学影响之源.....	14
一、柏拉图：文学的总体认识.....	14
二、柯勒律治、卡莱尔、华兹华斯：文学的创作思维.....	15
三、歌德：文学的“人性”写作.....	18
四、蒙田：文学的创作策略.....	20
五、钱宁：文学的民族性.....	21
第三节 小结.....	21
第三章 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准则与作者的“伦理化存在”.....	24
第一节 作者创作的伦理责任.....	25
一、作者的伦理使命.....	25
二、人格化书写.....	27
第二节 作品伦理思想的表现过程.....	28
一、基于生活的直觉式表述.....	28
二、基于生活的道德理性.....	30
三、“伦理化存在”主题的意指.....	31
第三节 文学伦理效果的实现策略.....	32
一、基于自然的想象与象征.....	33
二、人物性格的典型化.....	36

第四节 爱默生的传记创作实践理念	40
一、传记文学的功能	40
二、传记创作中实现精神性表述的要素	41
三、叙事的主观性与历史的客观性的平衡	42
第五节 小结	44
第四章 爱默生的文学阅读伦理准则与存在意识的读者建构	47
第一节 读者阅读的伦理使命	48
一、读者的阅读态度	48
二、自主化阅读	50
第二节 读者的伦理导向性阅读的理解层次	51
一、基于生活经验的审美情感	52
二、基于伦理道德的理性思考	53
三、“伦理化存在”的道德感悟	55
第三节 文学伦理内涵的剖析策略	56
一、阅读的想象性体验	57
二、读者的自我阐释：自主性与自律性	58
第四节 小结	61
第五章 爱默生的文学文本伦理预设与文学的“公共之善”	65
第一节 文学文本的“整体伦理功能”	66
一、“审美合力”的文本意图	67
二、伦理精神的传承	68
三、文学的“整体性”内涵与意义	69
第二节 文学文本基于“社会伦理功能”的伦理预设	71
一、和谐：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存在	73
二、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存在	75
三、责任：人与社会间的伦理存在	77
第三节 文学伦理文本的“公共之善”	79
一、文本与“伦理化存在”的意义	80
二、“个人之善”走向“公共之善”	82
第四节 诗歌的伦理预设：从“天地自然”走向“人化自然”	85
一、“人化自然”诗歌的构成与内涵	86
二、从“天地自然”走向“人化自然”：以《杜鹃花》为例	87
三、“人化自然”诗歌的意义	91
四、“人化自然”与“道法自然”的文化启示	92
第五节 小结	95

第六章 爱默生的普世价值理念与文化启示.....	97
第一节 普世价值理念的内涵.....	97
一、文学中普世价值的共鸣.....	98
二、普世价值与共识民主.....	99
第二节 爱默生“世界大同”的构想.....	100
一、国家的民主化存在.....	101
二、国家：作为“世界公民”的伦理责任.....	104
第三节 世界主义视域下文学和文化的交往模式.....	106
一、文学从“意境”到“意蕴”的诗学反思与对话融合.....	106
二、世界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学的阅读模式.....	110
三、全球化背景下由“点”向“域”的文化思考.....	112
第四节 小结.....	113
第七章 结论.....	117
参考文献.....	122
附录 爱默生作品中译本.....	135
后记.....	138

第一章

绪 论

作为美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奠基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面思想旗帜，被称为“康科德的圣贤”、“新英格兰的先知”、“最睿智的美国人”，其影响旷古烁今。1775年，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美国不愿继续受到压制和束缚，美国独立战争由此爆发，“独立”和“民主”成为美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口号和目标。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民继续为全面实现自由与民主而不懈努力，他们亟须探索和建立新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随之而来出现了物欲膨胀、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爱默生指责道：“由于教育目标的滞后，国家的精神正在日益殆尽……曾经怀着最美好的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的年轻人，如今却发现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今非昔比。”^[1]爱默生为商业环境下人性的沦丧和希望的幻灭感到悲愤，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他在《人即改革者》中尖锐地指出：“美国人拥有许多美德，但是他们缺少信仰与希望。”^[2]为了解决道德衰退的问题，爱默生认为文学作品具有教育和启发民众的作用，他希望通过文学来培养人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理想、塑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呼吁有识之士共同承担起建设思想文化的重任，引导广大人民通向高尚的道德境界；他身先士卒，称自己是一个“为大众精神的解放而呼喊的人”，他愿意为了实现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建立民主公正的美国社会而身体力行。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爱默生的思想是对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精辟概述，作为时代的革命力量，爱默生和中国的鲁迅一样都将文学视为“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3]。研究爱默生思想具有文学和文化层面的双重意义。第一，爱默生的思想为美国建立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学指明了方向。他一生倡导自由和民主，主张以积极向上的思想信念和人文主义理想作为美国文学的鲜明特色，并以此消除美国对外来文化的依赖；通过建立和巩固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来推翻长期以来固化的历史成见。他注重文学作品的效果，强调作品应该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爱默生的思想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他发起的超验主义运动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目的就是要提升人们的精神

[1]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Brooks Atkinson, e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 68.

[2] [美]爱默生：《人即改革者》，吉欧·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60页。本书所引爱默生作品的中文译文基本出自该书，为标注方便，文中只注作者、原文题目和页码，不再另注。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生活。他呼吁美国人民要敢于直面自然和人生,要积极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并将促进人格完善和社会进步作为“伦理化存在”的目标。第三,爱默生的思想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爱默生是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表达了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强调的是具有归属性和共同体特性的个体,一种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双重属性的个人主义。第四,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作为“自立精神的代言人”^[1]、“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2],爱默生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称他是“那些愿意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们的朋友和帮助者”^[3],林肯称他为“美国精神的先知”,“美国的孔子”^[4]。可以说,爱默生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如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全球化的考验和挑战,它们在思考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保持和发扬本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可以从爱默生的思想中获取一些启示和答案。爱默生思想的伦理特征是:从“作者—读者”来看是一种狭义的文学伦理,涉及文学叙述和伦理叙事的生成机制问题;从文本来看则是一种广义的“审美合力”,它与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生成具有密切关系。爱默生的思想也涉及了对诸多悖论如个体伦理/集体伦理,他律/自律、普遍主义/相对主义等问题的解答。

综上所述,选取爱默生作为研究对象是文学研究重读经典的需要。在当下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模式的时代,从西方经典文学中探索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经典文学价值的再发现,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注入积极的精神激励。

目前国内关于爱默生的研究成果中,有关爱默生思想研究的专著数量甚少。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从思想源头来说,爱默生思想的形成涉及广博庞杂的知识渠道,要想在其众多的思想影响中厘定一条思想发展的主线,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其二,从思想体系来说,爱默生的思想观点散见于各个散文篇章中,警句式的语言寓意深刻但却削弱了句意间的衔接和连贯,这无疑增加了分析理解的难度。其三,从思想内容来说,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精神一直被视为理论难点,里恩·霍华德(Leon Howard)半个世纪前就声称“很少有读者能理解爱默生思想理论的哲学内涵,能听懂他演讲的听众就更是凤毛麟角了”^[5]。上述三个方面确实是在爱默生思想研究的过程中较难突破的瓶颈,也正因为如此,选取爱默生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有必要从理论源头对爱默生的思想进行梳理和论证,有必要确立一套合理的研究思路力求较为全面地呈现爱默生的思想精髓。

爱默生的思想是多元的,整理出一套系统的爱默生思想并不意味着对它进行总体化概述,而是指出这种思想是以“伦理特征”为切入点,能够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功能、文化阐释和时代意义的理解中发挥指导作用。^[6]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对爱默生的思想进行梳理,凝练成一条思想线索,从中呈现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通过总结爱默生思想来进一步阐释爱默生对于美国民族文学、美国民族精神和美国民族文化建构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揭示美国浪漫主义文

[1] Robert E. Spiller, "The Four Faces of Emerson", in Thomas Edward Crowley ed. *Four Makers of the American Mind: Emerson, Thoreau, Whitman, and Melvill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

[2] John Paul Pritchard, *Criticism in America*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6), p. 43.

[3]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诗人和文化批评家。1883年至1884年期间,他到美国多个城市讲学,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中,他用这句话来称赞爱默生。

[4] Phillips Russell, *Emerson: The Wisest American*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206.

[5] Leon Howard,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0), p. 152.

[6] 根据何怀宏对“伦理”的定义:“ethics”(伦理)源自希腊文“ethos”,原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等意思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大概是将“伦理学”(ethics)作为严肃术语使用的第一人,伦理学由此成为一门有系统原理的、独立的学科。后来罗马人用“moralis”来翻译“ethics”。一般情况下,“伦理”多用来指规范和理论,而“道德”多用来指具体的现象和问题。何怀宏指出“‘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大致相同,经常可以互相换用”。参见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4页。本书叙述中并未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严格区分,表述抽象精神原则时使用“伦理”一词,表述具体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时使用“道德”一词。

学如何关注人们心灵的整体发展状况以及共同的伦理道德追求。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书借鉴德国艺术史家卡尔·施纳斯(Karl J. F. Schnaase)把“精神的因素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本质的价值,并运用包含着经验主义和推论的辩证的方法,对艺术和文化加以综合”的研究思路,^[1]将“伦理化存在”作为核心思想,以“经验—理性”的认知发展规律作为隐形线索来构筑内容框架,展开对文学和文化的多重讨论。本书以19世纪美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运用心理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视角分别从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四个方面分析爱默生思想的伦理特征,从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审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和美国民族精神的实质,并站在宏观的文化视角探讨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爱默生“世界大同”理想的文化意义,力图多维度地展示爱默生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本书采用宏观论述和文本细读、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爱默生的思想进行归纳和总结,探讨爱默生思想的时代意义;通过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立体地把握爱默生对于个人、伦理、命运、责任、民族、世界等问题的思索。本书通过展示爱默生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重构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审美表达,揭示了文学与人类生活、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

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论之外,本书主体分为五章。第二章详细追溯了爱默生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根据历时和共时两条线索分别从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对影响爱默生思想的理论进行归纳,从中总结爱默生思想的发展路径、概念框架和理论特点。这一章主要围绕人的认知特点和同一精神的伦理价值为论述焦点,为第六章展开的爱默生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的研究奠定基础。

接下来三章围绕“作者”、“读者”、“文本”三个关键词对爱默生的思想内容展开论述。^[2]第三章探讨了作者创作的伦理准则。首先从文学创作理论和认知思维的层面阐述了作者的伦理使命和作品伦理思想的表现过程。爱默生将“伦理化存在”确定为文学的创作目标,利用想象、象征以及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作为实现文本伦理效果的叙事策略。第四章论述了文学阅读的伦理准则,强调个人意识的自觉性,以及实现“存在”伦理意识的主体建构。这一章的内容安排与第三章相呼应,首先阐述了读者阅读的伦理使命和以伦理为导向的阅读理解层次。内容上的这种呼应式安排是为了强调读者和作者在认知发展路径上能够产生思想共识作以铺垫。爱默生将阅读的象征性体验和读者的自我阐释作为文本伦理内涵的剖析策略,强调读者阅读的自主性,表达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爱默生同时规定了读者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自由,读者的自律是实现价值判断的中立性与体现社会群体属性的前提。第五章则是在作者和读者思想共识的基础上,论述了文本的伦理功能与社会意义。结合个人“存在”的社会属性,爱默生论述了“伦理化存在”的三种普遍联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并将它们所反映的伦理精神作为文本预设的类型化主题,指明个人的“伦理化存在”亦是一种道德规范性的社会性存在。这一章将从社会意义上再次阐明“伦理化存在”的精神实质,以及个人“存在”如何在满足个体精神的同时亦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特别强调了个体和整体、特殊和一般的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以爱默生的诗歌《杜

[1] [意大利]里奥奈罗·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卡尔·施纳斯(Karl J. F. Schnaase, 1798—1875),德国艺术史家,1843—1864年撰写了总括性的艺术史。

[2] 本书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以“作者”、“读者”、“文本”、“世界”设置研究内容框架,借鉴了古斯塔夫·万·克朗姆福特在《爱默生的伦理学》中的观点,他认为利用艾布拉姆斯对传统艺术批评中诸种坐标的分类方法,即把艺术家、欣赏者、作品、世界四个坐标进行的三角形架构有助于阐释爱默生的文学观。他还指出爱默生关注作者的自我表述能力以及文学对读者的启示功能都对应了艾布拉姆斯以“表述”和“实用”为导向的文学创作理念。参见Gustaaf Van Cromphout, *Emerson's Ethics*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p. 147; Meyer Howard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58, pp. 3-29。在爱默生的文学思想中,“作者”、“读者”、“文本”、“世界”四个内容模块中的前三者是并存的逻辑关系,而“世界”则是一种基于前三者的推导性论述。

《花》为例剖析了价值预设 in 文本实践中的实现策略以及文化启示。从爱默生的整个创作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思想的系统性表述和实践性应用,爱默生肯定了文学伦理精神的相对恒定性和变化性,显示出超越时代的哲理智慧。

第六章是在“作者”、“读者”、“文本”三章围绕精神共通性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视角展开进一步探讨。爱默生从世界层面提出了普世价值理念,并基于当时的现状对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普世价值是世界发展进程中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建立共识民主的前提。爱默生“世界大同”的构想希望人类通过伦理法则能够实现整体的和睦共处,国家间通过协作式发展共同促进世界的繁荣有序。作为“世界公民”的各个国家有义务遵守普世价值,为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爱默生在文化视角上把“伦理化存在”看作一种有着特定目的和潜在规律的普遍性存在。他提出国家的“民主化存在”表明“世界大同”不是同质化的过程,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证明了全球化为多元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世界主义视域下文学和文化的交往模式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实现认知观念的转变。

第七章结论。综合上述几章的分析,本书总结了爱默生关于文学要素之间的有机环动模式,以此说明爱默生的思想不仅具有文学和文化的双重内涵,而且展现了人文性、社会性和世界性的特点。通过研究爱默生思想可以阐释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不同于传统浪漫主义文学的创新之处,同时理解其思想如何推动了美国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建构,以及如何促进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和谐共处。

可以说,爱默生的思想既融合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也包含了他的批判性理论和现代性观念。他提出的个人主义与世界公民、文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等概念在本书中实现了内在统一。本书主要涉及的内容可以归纳为:(1)爱默生思想的主旨在于以文学为媒介对美国社会文化进行审视和建构,包括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三方面关系的思考和总结。(2)爱默生的思想呈现跨越式的特点,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种文学流派或传统观念的条条框框中。爱默生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审慎观察和思考,从“经验—理性”的认知逻辑和伦理、社会、文化等多重视角引导人们关注美国的现实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在结构安排上,本书以“感知经验到抽象理性”的认知发展规律作为内在逻辑线索贯穿全文,注重章节间内容的连贯性和对称性;以“作者”、“读者”和“文本”作为主体研究内容,展开对爱默生思想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双重探讨。

第三节 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学术价值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1931年亨利·希德·甘比(Henry Seidel Canby)批评爱默生的创作在文本结构上缺乏逻辑性^[1];1973年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评价爱默生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影响巨大的重量级人物”^[2];2000年托尼·坦纳(Tony Tanner)批评爱默生的写作不过是比喻的游戏,因而作出了爱默生并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这样偏颇的论断^[3];2008年肯尼斯·塞克斯(Kenneth S. Sacks)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爱默生在美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相当稳固,他不再被视为一个思想杂乱无章的神秘主义者,他因为承认真理具有永恒和流变的双重特征,推动了民主个人主义观念革命而享有盛誉”^[4]。可以看出近百年来西方学界对于爱默生的评价莫衷一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学者不能从宏观的视角去全

[1] 亨利·希德·甘比(1878—1961),美国作家及教育家。Henry Seidel Canby, *Classic Americans: A Study of Eminent American Writers from Irving to Whitman with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of Our National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31), p. 150.

[2] Cleanth Brooks, et al.,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p. 670.

[3] Tony Tanner, *The American Mystery: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Emerson to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4] Ralph Waldo Emerson, *Em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Kenneth S. Sack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troduction, p. xiv.

盘审视爱默生的思想,而只是在他警句般的话语中斡旋,是不可能真正地了解爱默生的。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曾指出文学批评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批评家往往只根据文学四要素(艺术家、欣赏者、作品、世界)中的一个要素就来界定和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呈现研究对象的部分特点而非全貌。^[1]因此,本书将文学四要素全都纳入研究范畴,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集中对爱默生思想中的“伦理化存在”展开细致分析,进而对爱默生思想作一个整体上的鸟瞰。本书是在充分利用国内外文献和掌握国内外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进行的,文献资料丰富翔实,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学术参考价值。

第二,本书以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历史、政治和文化为背景,以思想史研究和历史主义研究为基本方法,将爱默生的思想与“伦理化存在”相联系,并置于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来剖析其思想的丰富内涵。本书无论对于爱默生研究,还是对于美国文学研究而言,都拓展了研究的维度,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第三,爱默生的思想中蕴含着哲学理念,“文学的哲学化”虽然是理解之途上的一座“冰山”,但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爱默生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成功尝试,为萨特“文哲一体”的存在主义文学叙事奠定了基础。^[2]姚斯曾说:“取得成功的研究和富于意义的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在于从任何可靠的常规学问中发现空白,而在于认识到一种可行的、但迄今很少用过的探询方向。”^[3]本书选取伦理学这一文学界最新关注的视角对爱默生思想中的伦理精神展开研究,并结合时代意义进行探讨,观点和结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时效性。

第四,爱默生的思想如同多棱镜折射出多种意蕴,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正是由于他的思想具有多面性、广泛性的特点,因此完整、系统地概括其思想是一项具有挑战性、艰巨性而又有意义的工作。爱默生的思想散见于他的各部作品中,并不具备系统的形态,因此本书涉及文学、伦理学、美学、文化等多领域、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旨在将爱默生的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摆脱散乱无序的境地。本书以认知规律为逻辑线索,从爱默生的思想中推导出他的文化世界观,并进一步阐释爱默生所开创的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精神实质和文化意义。

坦率地说,研究爱默生的思想需要研究者在多个学科领域具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对本人来说的确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正如爱默生所言,文本阐释是一个包含多重视角的开放空间,^[4]至于他的思想在其他方面的丰富内涵,这里不可能全部呈现。本书仅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美] 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 Bernard Smith, *Forces in American Critic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9), p. 113. 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艺术和哲学就是相互渗透的,“神性和理性和谐与共,哲学、艺术平行发展,人类的德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参见于文杰:《欧洲近代学术思想的心灵之旅——论西方三分及其中介理论的历史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0页。爱默生的“文学的哲学化”倾向被认为能够促进时代的总体精神,爱默生开启“存在主义哲学之先河则是近20年来爱默生研究中的热点论题”。参见刘晓晖:《爱默生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兼评劳伦斯·布尔的〈爱默生〉》,《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60页。萨特的伦理叙事把自由看作最高原则,关注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爱默生不同的是萨特的叙事被波伏娃称为“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因为他展现的是现代人在艰难的处境中无从选择的犹豫和茫然,而爱默生展现的是“自明式”伦理。

[3] [德] 汉斯·罗伯特·姚斯:《我的祸福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式变化》,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4] 爱默生:《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第1298页。

爱默生思想形成的渊源

爱默生家族有着悠久的清教主义传统，最先来到美洲大陆的一代是托马斯·爱默生（Thomas Emerson）于1635年在马萨诸塞州定居，那一代人拥有强烈的土地意识；到了约瑟夫·爱默生一代（Joseph Emerson），他们恪守清教主义精神；约瑟夫·爱默生之后的爱德华·爱默生（Edward Emerson）和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是继承和发扬清教主义传统的两代人，追求和捍卫一种精神自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是爱默生家族在美国大陆定居的第五代人，从小深受清教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认同清教思想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民族精神。爱默生反对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和“命定论”的教旨，认为宗教不能漠视人的意志和本能、让人望而仰止，而是要尊重人的主体精神。

爱默生并没有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宗教的槛花笼鹤，即使面对他所信奉的唯一神教，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其刻板的布道形式。爱默生主张教旨要深入人心，其核心功能在于传达崇高精神。为了更好地了解爱默生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其思想形成的源流和理论基础。爱默生曾说：“我们有时常会感到某种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精神力量和创造力量，这种力量卓尔不群，它们通常被称为哲学和文学。”^[1]可见，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学理念都是爱默生思想形成的渊薮，因此本书将集中从这两方面展开影响之源的分析。另外，爱默生在《诗人》中说：“按时间顺序，思想和形式是同等的，但根据起源的顺序，思想则先于形式。”^[2]因此本书先从影响爱默生思想发展的哲学影响之源开始，然后再从影响爱默生的创作形式和创作意图的文学影响之源逐步展开分析。

第一节 哲学影响之源

1882年爱默生辞世之后，查尔斯·埃姆斯称爱默生“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兼具学养和独创性的哲学家”^[3]。的确，爱默生的思想集各派哲学思想之大成，虽然表面上显得繁杂无序，但并没有因其来源广博而缺乏逻辑，如果追溯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从中厘清其思想脉络。

自17世纪以来，“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最突出的迫切问题是认识世界，大力发展科学，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要解决的是认识论问题，是通过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新方法的运用，

[1] Ralph Waldo Emerson, *Letters and Social Aim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3), p. 49.

[2] 《诗人》，第499页。

[3] Charles G. Ames, “Obituary Notice of Ralph Waldo Emerson”,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20, No. 112 (Jun. - Dec., 1882), p. 503.

发现事物的规律和万物的法则”^[1]。爱默生盛赞桑普森·里德的《心智成长之观察》是继柏拉图之后的最好的一本著作，里德指出，“现今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世界上的一切变化都源于心智”^[2]。里德与康德一样，确信心灵法则和自然法则都是世界上固有的存在。这本著作为爱默生开启了一扇通往人类认知思考的大门，引导他开始对思维方法和世界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

追溯爱默生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追溯他知识理性的形成过程。爱默生关注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与自我完善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断探索指导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心灵法则。他坚称人类有能力超越感官经验的世界，坚信宇宙中伦理精神的普遍存在以及人类自身的巨大潜力。伦理是一种至高理念的存在，通过伦理道德基于情感的可知性、道德行为的现实性实现对人们的道德启示功能。爱默生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渗透着各派伦理思想的影响，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认知层次。

一、苏格兰常识哲学的“道德感”

苏格兰常识哲学是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出现在英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创始人是托马斯·里德（1710—1796）。“常识”意味着人类普遍接受的经验。苏格兰常识哲学不同于伽桑丘、狄德罗、霍尔巴顿和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也不同于莱布尼茨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它认为外部世界和心灵都是存在的。里德的学生和信徒杜格尔·斯图尔特（1753—1828）推动了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发展，开启了以道德为核心的思维方式。爱默生在哈佛求学期间，苏格兰常识哲学在美国曾一度流行，他接触的道德哲学课程主要是关于杜格尔·斯图尔特的思想研究。在《人类思想的道德要素》、《论文：形而上学、伦理和政治哲学史发展概览》中，^[3]斯图尔特用物质和精神的二分法来界定知识的本质，指出知识是直觉感知的产物，道德理解和道德教育具有普遍性，是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与怀疑论进行比较之后，斯图尔特指出苏格兰常识哲学坚持道德上的现实性，关注“我应该如何度过一生？”斯图尔特的观点影响了爱默生思想发展的导向。苏格兰常识哲学的主旨就是人类都具有一种被称作道德感觉或道德情操的思想内涵，表现在人类本性中的感觉和同情心上。爱默生由此肯定了思维主体具有道德认知的能力。他推想既然道德知识也是直觉反映的结果，道德认知和道德教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基本相同或者基本对等的，那么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具有弃恶从善、指向某种价值的共同点。“某种价值”其实就是里德所称的共识，抑或斯图尔特所称的人类信仰的基本法则，代表着人类普遍的伦理精神。1821年爱默生曾撰写过一篇名为《伦理哲学的现状》的文章，试图探讨普遍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但并不确定这种价值的本质特性，只是朦胧地将之与自然法则的基本特性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普遍价值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也必将适用于未来。

爱默生总结了在苏格兰常识哲学中道德认知的两个条件，即经验和反思，并将之作为反驳休谟怀疑论的基础。休谟怀疑思维的存在，认为思维的本质是想象，他否认因果关联，只承认序列的存在。休谟怀疑论的最终结论是人类不具有推导概念的能力，这是对人类理性认知的否定。^[4]对于休谟的普遍怀疑论，爱默生试图用苏格兰常识哲学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人类具有道德理解的普遍性。他在1822年的日记中写道：“道德感遍布在所有有智识的人们当中”，“是神性的永恒

[1] 王利红：《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14页。

[2] Robert D. Richardson Jr.,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93), p.198.

[3] Dugald Stewart,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Strahan, Printers-Street, 1802. Dugald Stewart, "Dissertation: Progress of Metaphysic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the Revival of Letters", in Wm. Hamilton, ed. *Collected Works of Dugald Stewart*, Edinburgh: Thomas Constable And Co., 1854.

[4]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认为思想无法反映和再现客观世界的真实，他的怀疑论驳斥了因果关系。

特征”^[1]，神圣的道德感指导人们的言行举止，证明人们的存在意义。爱默生提出的“普遍的道德感源于精神”这一论断首先肯定了思维的存在，因为智识是思维理解的结果。其次爱默生强调经验是理解的前提，因为心灵反思的结果必然唤起道德感悟，而道德理解差异的直接原因在于经验的不同。可见，爱默生既强调了思维的存在，同时也再次论证了思维主体基于经验的认知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爱默生使用“道德感”（moral sense）一词来区别精神理性和逻辑思考，它强调一种主观的自然情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爱默生用这种命名来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对主观情感的压制，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此时爱默生的思想尚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矛盾阶段，因为这种被简单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的“道德感”具有自发性、即刻性的特点，这种看似具有自明性的“道德感”实际上侵占了人们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如果人们仅仅出于本性来接受“道德感”，那么“道德感”其实是“脱离经验的一种产物”。^[2]虽然爱默生提到了经验和反思，也意识到心灵只有在物质世界里才能够证明自身，不过他对于主体自我感官的过分强调带有某种人类感性认识的原始色彩，这表明他在抨击休谟“思维的本质是想象”的观点方面存在一定的疏忽和漏洞。

事实上，苏格兰常识哲学是在直觉层面来讨论道德，斯图尔特也将自己的思想称为“直觉哲学”，这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的观点有所出入。亚当·斯密说：“由于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感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除非我们设想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3]他认为当人们对他人的遭遇表示出同情的时候，也会再次反思自己在类似情境下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这意味着道德情操源于相同的感受以及同情心，其涉及的对象不仅包括自我，也包括他人。苏格兰常识哲学仅仅在乎个人的道德感知，忽略了人类情感的同源性。爱默生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明白心灵和外部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类本性都是并存和互通的。伦理道德的探讨是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性和外部世界的关联而展开的理性思考。因此，爱默生后来转向康德哲学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的确开启了爱默生道德意识的萌芽。

二、格兰多哲学的关联认知

1830年爱默生开始接触法国哲学家约瑟夫-玛丽·德·格兰多（1772—1842）的哲学思想。格兰多在三卷本《哲学系统中的历史比较》中指出哲学取代了狭隘和保守的神学研究，它能够明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中总结出规律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格兰多的《自我教育》认为人的一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教育使人趋于完美，^[4]格兰多哲学为爱默生指明了通过自我教育来实现神学的教化功能。如果说爱默生在初期阶段思考的是本性的“道德感”的话，格兰多哲学则为爱默生树立了新的信仰，开始关注“积极的道德力量”^[5]。爱默生认同格兰多哲学强调自我教育的社会基础，并对个人存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思考。

概括说来，格兰多哲学对爱默生的思想影响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爱默生承认个体存在的社会性。社会是个体存在的基础，自我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社会道义。格兰多哲学提出“离开

[1] Ralph Waldo Emerson,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ward Waldo Emerson, Waldo Emerson Forbes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09-1914), vol. I, p. 186.

[2] Merrell R. Davis, "Emerson's 'Reason' and the Scottish Philosophers",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17, No. 2 (Jun., 1944), p. 213.

[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人，经济学鼻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主要论述了如何运用同情心和正义感来控制利己主义行为，旨在建立和谐发展的人类社会。他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和人类情感就会促进人类的共同福祉。

[4] Joseph-Marie de Gerando, *Self-Education: Or the Means and Art of Moral Progress*. Elizabeth Palmer Peabody trans, Oxford: Marsh, Capen and Lyon, 1833. 这本书法语版的标题是 *Du Perfectionement Moral*。

[5] Merrell R. Davis, "Emerson's 'Reason' and the Scottish Philosophers", p. 215.

社会,人无法真正成为一个人”,“离开他人的正义,个人的正义是毫无价值的”,^[1]这些观点与后来康德的绝对律令相仿,即大家共同遵守既定的准则。其次,爱默生不满足仅仅从表象上指出道德理解和道德教育的普遍性,他转向对道德普遍法则的探索。格兰多在《历史比较》中探讨了哲学的基本问题,通过比较总结出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永恒主题都关乎普遍的道德感。格兰多将社会和自然进行类比,认为社会是自然的表现,二者都具有唤起人们内心感受的作用。这一类比激发了爱默生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他设想探究自然法则的过程将会对探索道德法则有所启示。爱默生借鉴毕达哥拉斯学说将道德原则的内涵喻指为宇宙中的秩序与和谐,并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毕达哥拉斯指出节制即美德,“自我控制”是实现节制的手段,这是对个体存在的社会属性问题的进一步补充。^[2]爱默生的思想也得益于赫歇尔的《论自然哲学的研究》,赫歇尔信守原理和法则是人们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这坚定了爱默生探寻法则的决心和立场。^[3]爱默生已经不再像苏格兰常识哲学家那样从人的内在直觉来思考问题,而是结合外部自然转向思考内心本质,尝试将心灵与自然相对应,认为“积极的道德力量”是所有力量的源泉。不过此时的爱默生正处于理性认识的萌芽时期,他尚不清楚该用什么名称来界定这种“积极的力量”,他经常把“灵魂”、“精神”、“道德情感”、“普遍性”等词语交替使用,不过这为他后来确立永恒和无限的理念奠定了基础。^[4]

爱默生的思想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直觉向真理的转变。例如1832年爱默生布道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生活的道德本质和道德的自我教育。即使后来辞去牧师工作,爱默生仍然坚持对普遍法则的不懈探索,他正在步入一条由“知”到“思”的哲学之路。

三、斯多葛哲学的理性之维

爱默生真正的道德理性思考源于斯多葛哲学的影响。斯多葛哲学(The Stoics),源自希腊语stoa,意为“门廊”,是由芝诺(Zeno)于公元前四世纪在雅典创立的学派。斯多葛学派是自然法理论的奠基者,认为宇宙代表绝对理性,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宇宙理性是万物的主宰,人类要学会自律,使行为符合宇宙理性从而实现“伦理化存在”。斯多葛哲学认为理性具有提供“共同观念”(common notions)、反映共同经验、从能动认知中总结知识和真理的功能。虽然格兰多哲学是爱默生开始思考普遍法则的转折点,但是后来他通过阅读普卢塔克的《生命》转向了研究斯多葛哲学来讨论人们“伦理化存在”的法则。“与清教主义的影响相比,斯多葛哲学对爱默生的影响更为深远。斯多葛哲学关注性格品质的问题,而且还为判断性格品质提供了潜在的依据,指导人们从自然中寻找道德原则的根源。”^[5]爱默生利用自然法则来认识人类社会“伦理化存在”的普遍原则,例如自然中生态美的规律“揭示了地球生命系统有机统一、结构和谐以及自我组织、自我演化发展的固有属性,并因此能给人以美好的感受的共性”^[6],这表明自然与人类之间联系密切,人类通过自然复现了精神世界。

[1] Robert D. Richardson JR.,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p. 102.

[2]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72 B.C.—497 B.C.), 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例如古希腊人用黄金分割比例来创作诸如女神维纳斯等,作为展现人体和谐美的范本。他同样用数来解释精神世界,强调自律是一种美德,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

[3] 约翰·弗雷德里克·威廉·赫歇尔(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 1792—1871), 英国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参见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 Merton M. Sealts, JR., “Emerson on the Scholar, 1838: A Study of ‘Literary Ethics’”, in Robert Falk, ed. *Literature and Ideas 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2-43.

[5] Robert D. Richardson JR.,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p. 233. 斯多葛哲学主张真实的道德离不开知识,它赞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上所有个别的事物都是一个基本物质的表现”的观点,认为存在一种统领自然进程和人类行为的法则。斯多葛哲学关心的伦理问题是“我该如何生活?”,它宣称既然同一个法则统领人类和自然,人们可以从自然中领会心灵法则。斯多葛哲学也强调了个人意志的重要性。

[6] 张相轮,余士生:《艺术、科学与人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